

析五四先驱们“西化”观

——以陈独秀、胡适为例

曾永恒

(西昌学院 思政部,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不是全盘西化论者,在他们的西化思想中,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就此,本文将他们的西化观略作分析。

【关键词】五四;西化;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2-0064-03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P1358)}西化思潮就是在这种深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从清末民初发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兴盛的。

五四先驱们在反思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革命仅仅停留在社会政治界的表层,而未触及伦理道德及人的精神界。故此,陈独秀指出:“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P41)}而要实现“伦理的觉悟”,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所谓的“国粹”,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P152)}。“决计革新”的陈独秀等人主张的当然是“采用西洋的新法子”。

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虽然主张“西化”,而且作为五四前期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并不像有的学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中国“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他们的西化观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承认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承认中国文化不如人;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其三,反对复古主义,也反对“中体西用”式的折中调和论,而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批判、改造乃至取代中国文化,实现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结合。

毋庸置疑陈独秀是主张“欧化”的,他用了一个

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判断把“新输入之欧化”与“中国固有之孔教”完全对立起来,但他并没有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和要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譬如,他对西方民主制度可谓倾心至极,但他又认为,这种制度“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关系,他在充分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又指责它“未尝无刻薄之嫌”。在输入西方学理方面,他并不赞成不加选择地盲目输入,而主张“应该看到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4](P590)},有则输之,无则抛弃之。就他本人的实践来看,五四时期他着力介绍的主要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故此,30年代那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也认为:“陈氏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以外别没所要。那么,陈先生所要的西化却非全部的西化,而是部分的西化”^{[5](P172)}。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就更难说他是一位“全盘西化论者”。他本来就是一个贯通中西的学者,所以在如何西化的问题上,他是一位既要西化又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人物。1917年他在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印行,1983年12月学林出版社以中文出版,更名为《先秦哲学史》)中,就明确反对用西方所谓“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的“旧文化”。他指出:“如果运动,用新的伦理道德取代旧的伦理道德,建立新的西方近代文化为依旧的价值系统”。用他的话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采取有组织的吸收形式,而是采取全然替代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故此他认为,中国人当时在文化上面临

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从而“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自己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为此,他就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其一,使中国哲学“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本来的地位”;其二,使非儒学家得到恢复,“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以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以被忽视了的本国的学派”;其三,“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的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和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6](98-9)]。不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卷上(1919年出版)中继续坚持了上述主张。他指出,“今日的哲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汉学家给我们的古书,二是西方的哲学学说。中国所面临的的就是中国这两大哲学系统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有可能,也应该通过对中古哲学之精华的吸取、融合,建立起一种‘中国的新哲学’,‘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7](8-10)]。最能说明五四新运动时期的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是1919年他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此文开宗明义就把“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两个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提了出来,这反映了胡适既要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吸取西方近代文化(“输入学理”),又要整理和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再造文明”)的思想和主张。而且在实践上,胡适也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的,在大力介绍和提倡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同时,他在整理国故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他的《红楼梦》考证及结论——《红楼梦》,成了“新红学”的重要范式。他对

《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古典小说和历史典籍的考证,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澄清了许多前人的疑误,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精僻见解。他整理国故所使用的方法,即所谓“大胆地假设,小心的求证”之“十字法则”,也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方法的简单搬用,而是实用主义方法、西方的近代科学方法和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沟通结合的产物。唯其如此,它才能产生重大影响。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书中便提出:“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就而言都系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打破了旧红学的那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支配红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只有援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已看到清代考证学自嘉、道以来便面临种种技术崩溃的内在危机,旧典范虽屡经修正而终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变异’,经过这一长期的发展,最后才有新典范的脱囊而出,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胡适本人在《清代的治学方法》中也说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前者体现于戴震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八字”精神之中,后者表现为清代学者对于考据求证的重视。故此,胡适再三强调,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最能触动国人灵魂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和精神革命,它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价值,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之路乃是西化之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彻底抛弃之,以全盘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陈独秀、胡适为例,可见他们对待西化文化本身就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中庸之道,也有中西合璧之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醒[A].独秀文存[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A].独秀文存[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4]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A].独秀文存[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5]陈序经.东西文化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胡适.先秦名学史(中译本)[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1.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The Analysis of the Westernizational View of Pioneer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aking Chen Duxiu and Hu Shi for Example

ZENG Yong-h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It's well known that Chen Duxiu and Hu Shi are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izational though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y aren't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al ones in their thought in which there are strong facto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the essay analyzes their westernizational views.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esterniz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李进)

(上接59页)

信心。在此后的灾区重建事业中,必须努力保持和大力弘扬这种战斗力,使抗震精神渗透到各行各业,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

(三) 抗震精神是创造力

这次抗震救灾工作,正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历史性检阅。没有30年全心全意谋求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没有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大的物质和技术保障、支持;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今天协调各方力量和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同时,信息的公开性、开放性以及公民民主精神的进步,更是对30年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刻反映。它让所有中国人深刻领悟了“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真正内涵。抗震精神的传承,民族创造力的巨大发挥,必将更加坚定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搞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2008,6.
- [2]孙章陆.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实现民族复兴理想中的重要意义[J],中国电力教育,2008,3.

On the Spiritual Value in Fighting against Wenchuan Earthquake

JIANG Mao-li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National spirit is the most precious wealth to a nation.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have annotated the earthquake-resistance spirit of a time during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widespread of earthquake-resistance spirit will certainly promot the moral construc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Then it will creat much more spiritual weath.

Key words: National Spirit; Earthquake-resistance Spirit; Value

(责任编辑:李进)